

中央苏区时期如何开展经济贸易

□ 聂刚 赵小湖 刘光龙

中央苏区时期，为破解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红色武装割据的特点，加强各革命根据地内部互相沟通和贸易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工作，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对外贸易体制机制，为中央苏区与白区交换了大量的商品及人力。以税收等政策为杠杆，调节私商进出口贸易的货物种类，保证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这些具体措施，使苏区经济建设卓有成效，支援了战争，巩固了政权，改善了群众生活。

成立对外贸易总局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越是困难时期，党的引领作用就越发鲜明。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组建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等机构，接着成立了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专门领导经济建设。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在此之后无论是农产品输出，还是工业品输入都通过贸易局，在其中扮演着中间人的重要角色。

对外贸易总局的成立以及地方分局和各地采办处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招商体系。对外贸易局“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矿石出口量，每年三百万担……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九百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六百万元”。福建事变后，中央苏区乘机与之打通关系并恢复贸易，输出农产品和引进一大批西药、食盐等物资。这大大加强了中央苏区和白区的物资交换，不同程度的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短缺的压力，同时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提供了物资保障。

发挥招商政策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先后制定和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对白区商人与苏区贸易实行“减收半税”的税收优惠，鼓励和保护私商参与苏区进出口贸易，对商人采取保护政策，鼓励私商开展赤白贸易。1930年3月通过的《商人条例》，对贸易进行严格要求，较好的规范了市场。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以及中共的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赚取了较好的利润。遍布中央苏区各地农村的圩场，每逢圩期便人头攒动，农民拿出农副产品到这里互通有无，或换回日用工业品。如湘赣边界党和政府修复和开辟了草林、大陇等

红色圩场，汀州四都区便有四都、楼子坝、溪口、谢坊等4个圩场，每圩贸易额从数百元发展到数千元以上，不仅搞活了经济，繁荣了市场，而且还巩固了政权。

开辟通商道路

1934年1月通过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赣南闽西地区，地处山野，道路狭窄不平，河道阻塞难行，给通商带来极大不便。苏维埃政府通过修筑道路桥梁，整修河道，确保通商道路畅通。

便利交通的同时，中央苏区积极建立与赣州城大商号的秘密商业关系。赣州是赣南经济贸易的中心，商贸业发达。赣州城有三家大商号，“广裕兴”经营百货，“广裕丰”经营南杂货，而“攀高铺”名为染布，实为经销钨砂。江口外贸分局与联合支部派地下党员侯礼湖等人潜入赣州城内，首先做通了“广裕兴”商号老板曾伟仁的工作，双方达成了互租贸易的协议。接着，又与“攀高铺”商号建立了联络，对方同意与江口外贸分局做钨砂的生意。不久，江口外贸分局便派人在赣州城内以开店为掩护长住下来，保持与这些商号的联络。至此，中央苏区商业和对外贸易取得大繁荣大发展。

招引私人资本投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钨矿开采及招商工作，准许私人资本承租开采，引进白区私商开采。通过中央政府自主开采和引进私人资本，苏区钨矿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私营业主在苏维埃政府感召下，也有出钱出物支援地方文教、交通建设。

同时，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由于出产钨精矿质量极佳且产量大，南昌、九江和广东等地的商人以及国民党将领，争相向中央苏区秘密采购钨砂，出口国外，以获取高额利润。赣南钨矿大多经过江口外贸分局售出。通过钨矿的交易打通对外贸易渠道，换取中央苏区所需物资。在福建事变后，中央苏区政府与新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恢复商品贸易，与“南天王”陈济棠私下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红军因此得以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向白区输出大量钨砂、纸等物品，换回食盐、布匹、药材等。钨砂的大量出口使中央苏区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从1931年10月至1934年10月，仅仁风山矿场产值就达到400多万银元，换取大量的急需物资，极大支援了中央苏区革命战争。

聘请白区技术人才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靠的是人才。由于苏区严重缺乏专门技术人才，苏区政府出台特殊政策对技术人才进行留用、选聘和调配。一方面是党组织从白区选派，如中央红军兵工厂的3个熟练技师：崔定武、韩日升、郝希英就是党组织从沈阳奉天兵工厂调来的，这三人后来都成长为兵工厂的厂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毛泽东责成中央政府颁布了“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以重金聘请白区各类技术人才来苏区工作。

苏区通过发布各类人才招聘、培养和人才优待等法规和文件，壮大苏区人才队伍。大批无线电人才，如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人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争取张辉瓒的第18师电台台长王净加入红军，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文化界人才如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赵品三等一大批文艺精英，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苏维埃戏剧人才。同时，广泛吸纳全国各地医护人才、工矿技术熟练工人，号召他们支持革命前往苏区工作。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些具体的政策和举措是对苏区商贸经验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贸易、解决军民吃饭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同时积极吸引私人资本，着力拓展对外贸易，创办合作社，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打出一系列“组合拳”，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建设，开创了苏区经济建设的生动局面，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苏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

创造了八年来胶东抗战的伟大局面

——牟平抗日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 郭星辰

牟平抗日烈士纪念塔矗立于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城区东部的端午山上，塔身呈方锥形，高14米，基座周长10米。塔身正下方白色大理石上刻“民族魂”大字，上方塑“牟平抗日烈士纪念塔”朱红大字，左、后的碑面上铭刻355名抗日烈士姓名，右侧的碑面上刻有碑文，全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牟平抗日烈士纪念塔是标志着牟平抗日烈士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这历史是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雷神庙战役开始的，是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副书记理琪同志等的鲜血写下了第一页。他们燃起了胶东的抗日烽火，唤醒了胶东八百万人民风起云涌的奋起抗战，创造了八年来胶东抗战的伟大局面。从此，牟平人民踏着理琪同志的血迹，继承着他的遗志，前仆后继的与敌伪英勇的搏斗着。在不断的反扫荡、反投降、反蚕食、反封锁、反治安强化运动、反重点主义等残酷的斗争中，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战线上，韩德祥、柳德山、葛善臣、王敏、李德茂、曲志九、房善亭、杨进禄、姜西岳、王书汉等三百五十余名烈士光荣的牺牲了，王忠敏、孙绳宾、王志文、于慈云等三十余名民兵流了最后的一滴血。这光荣悲壮的抗日历史，直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解放了牟平城才结束的。牟平独立营营长田夫同志等的鲜血写了最后光荣的一页。烈士们的壮烈牺牲，争取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争取了牟平三十余万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牟平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因此，烈士们的精神是与民族常（长）存的，烈士们的英姿是在人民中永远活着的。牟平人民纪念烈士的不是叹息、不是眼泪，而是悲愤的力量、钢铁的意志，踏着烈士的血迹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争取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实现。

牟平县全体人民敬立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碑文记述了牟平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打响胶东抗战第

一枪，到解放牟平的光辉历程和烈士们的英雄壮举，以朴实的语言表达了牟平县全体人民对抗日英烈的深切缅怀，展现了继承先烈遗志、争取更大胜利的豪情壮志，读后震撼人心，令人肃然起敬。

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入山东，本应担负保家卫国重任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为了了一己之私仓皇出逃，手下十多万大军以及地方官员不战而退，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山东人民自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2月5日，日军占领牟平县城。2月13日黎明，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县城内地下党员的策应下，攻克牟平县城。随后，第三军大部进入城南山区休整，特委书记理琪和林一山、宋澄等20余人来到牟平城南1公里的雷神庙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议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中午时分。

在我军开会之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得知牟平县城被攻占的消息，乘5辆汽车从烟台奔袭而来。由于对我军的轻视，加上集结匆忙，日军部队没有携带重武器。此时我军担任警戒任务的是一些新参军的农民战士，第一次面对日军，没有组织有效阻击，致使日军迅速包围了雷神庙。危急关头，理琪沉着冷静，冒着枪林弹雨，往返圈内指挥作战，很快便稳住局势。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第三军以少数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战员和劣势装备，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激战8个小时，打退数次进攻。天黑之后，牟平城东北方响起枪声，我军预先联络的友军赶来，伤亡惨重、无心恋战的日军不知虚实，只得仓皇撤兵。最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功毙伤日军50余人。战斗过程中，特委书记理琪不幸中弹，在转移路上壮烈牺牲，年仅30岁。

雷神庙战斗虽小，却打响了胶东抗战的第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日寇兵不血刃占领胶东的嚣张气焰。它是一剂治疗国民党“恐日病、亡国论”的良药，是振奋广大人民奋起抗战的号角，极大

地鼓舞和坚定了胶东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彰显了共产党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

全面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

日本侵略军在雷神庙战斗中吃了败仗后恼羞成怒，疯狂进行报复，1938年多次“扫荡”牟平，制造了“三月惨案”“牟平屠城”等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1942年，又出动大批兵力，接连发动春、夏、冬3次大“扫荡”，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还在牟平城、孙家滩等设置了14个据点，疯狂“蚕食”根据地。

在抗战形势最为艰难的时刻，英雄的牟平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奋起抵抗。牟平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全面开展敌斗争。在政治上，县、区、村都成立反“扫荡”委员会，积极发动群众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揭穿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并直接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村政权，破坏敌人的行政系统。在军事上，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伏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文化上，加强国防教育，普遍成立冬学，开办妇女识字班，并向敌区开展“一封信运动”，宣传国内外抗战形势。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不仅粉碎了1942年敌人的3次大“扫荡”，还迎来了形势的好转。

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自1943年下半年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积极主动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抗日根据地不断扩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刘国平

资本论》等进步书籍，彭德怀看后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并且多次向段德昌提出入党要求。在段德昌的介绍下，1928年4月，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彭德怀视段德昌为“革命引路人”。

根据地的游击战专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于敌众我寡的特点，只有开展游击战，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纵观段德昌的军事生涯，可以肯定地说，在打游击战方面，他算得上是一把好手。在洪湖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段德昌将掌握的军事理论同当时革命实际相结合，与周逸群创立了一套游击战理论。其基本原则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在此基础上，段德昌还总结出四条游击队的战略战术：分散游击，集中指导；避其锋芒，攻其不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该游击战理论与毛泽东、朱德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立足敌强我弱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保存自己，打击敌人。

正是在游击战理论指导下，段德昌率部对敌作战往往以弱胜强、屡克强敌，巩固和扩大了洪湖根据地。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汉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

根据地的证据”。

群众心中的“常胜将军”。“有贺不倒，无段不胜。”（贺指贺龙，段指段德昌）是湘鄂西苏区流传的一句话。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的主要战将，率部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屡显神威，使敌人闻风丧胆，根据地群众称他为“常胜将军”。

1932年1月，段德昌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佯攻应城，率红9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国民党第4师第12旅张联华部奉命前往解围。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后，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当敌进入伏击圈时，段德昌一声令下，公路两侧的我军犹如天兵下凡冲向敌人。此战，红军全歼第12旅，生俘张联华，歼俘敌军4000余人，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这一仗后，洪湖根据地范围扩大至应城县境。

2月底，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第48师第144旅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头移动。3月初，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144旅被困于文家墩，徐旅也退回天门。段德昌得知敌人的动向后，迅速带领红9师冒雨急行军一夜，于3月4日拂晓赶到文家墩，向144旅发起突然进攻。很快，全歼该旅4000余人，生擒旅长韩昌俊。

1932年6月初，川军第21军分4路进犯洪湖苏区。红3军在贺龙、关



大。到1944年6月，牟平县的根据地面积，已由1943年6月占全县总面积的43%发展到88%。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共牟平县委立即决定围攻牟平城。17日深夜，敌伪从北门向烟台方向逃窜。牟平独立营营长田夫率部追击，他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18日凌晨，牟平独立营整队入城，警备司令部布告安民，组织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牟平全境解放。至此，牟平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向应率领下奋起迎敌。范绍增率领的川军第4师占领了老新口一带，直逼湘鄂西首脑机关驻地周老嘴。新沟嘴是周老嘴的重要屏障，当时我军在那驻兵很少，形势万分危急。6月9日，段德昌奉命率红9师2个团星夜赶回新沟嘴，连夜组织防御。13日，段德昌派出小股部队到老新口袭扰诱敌，将第4师诱至新沟嘴，红军依托工事火力大开，敌人死伤惨重。与此同时，埋伏在新沟嘴以东的3个骑兵连，利用河堤掩护，迂回到第4师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接着红9师正面部队乘势进行反击。川军第4师腹背挨打，慌乱溃逃，红9师追至熊口一带，歼其大部。此次战斗，红军歼川军第4师1个多旅，俘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500余支（挺）。

1933年3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巴东县金果坪开会，检查根据地斗争失败的原因，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肃反”不力，并提出解散湘鄂西共产党等。段德昌认为洪湖根据地的丧失，主要原因是错误“肃反”和执行了错误军事路线。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3月25日，段德昌被诱捕，5月1日被杀害。

